

文稿

時代環境對紀昀著述之影響

黃瓊誼* 王鵬凱**

紀昀遭逢的時代正是乾嘉時期學術界漢學、宋學相爭的時代，也正是詩壇祖唐祧宋爭論非常激烈的時期。如此的際遇，使他的學術見解和詩論，都深深地受到當時時代環境的影響，因此他的學術見解與詩論，不可避免地會有許多針對當時現象而表達的意見。無怪乎阮元在《紀文達公遺集》序中，曾用「辨漢宋儒術之是非，析詩文流派之正偽」¹這兩句話來概括紀昀一生的學術成就，其中「辨漢宋儒術之是非」是指紀昀對漢宋學之爭的見解，而「析詩文流派之正偽」就是指出紀昀對唐宋詩之爭的見解。而紀昀的目標就是在辨漢宋儒術之「是非」和析詩文流派之「正偽」之後，能「屏除門戶，一洗糾紛」²。雖然紀昀無法達到這樣的目標，甚至因為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中對理學末流，特別是某些「講學家」，極盡諷刺、揶揄之能事，尤其是生動逼真地刻畫出某些講學家苛刻不近人情的形象、虛偽矯作假道學的形象，貶抑批判的意味相當地明顯，所以以致於有人視其為漢學陣營「乾、嘉時代反程、朱的第一員猛將」³這樣功魁般的評價，也有人認為「近世氣節壞、學術蕪，大抵紀昀之罪也」⁴、「數百年風氣之衰，紀氏之過也」⁵這樣罪首般的評語。但是在《閱微草堂筆記》中，紀昀也曾透過多則故事表達對門戶之爭的惋惜與痛恨⁶。因此紀昀對漢、宋二學

* 南開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專任講師

** 南開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¹ 《紀曉嵐文集》第三冊，前揭書，727 頁。

² 〈獻縣學案〉，《清儒學案》第 4 冊卷 80，徐世昌，世界書局，1962，頁 1。

³ 如余英時即稱紀昀為「乾、嘉時代反程、朱的第一員猛將」，《論戴震與章學誠》，華世書局，1980，頁 106。

⁴ 《新學偽經考》三上，康有為，《續修四庫全書》179 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 497-498。

⁵ 《紀昀評傳》引平等閣主人（狄葆賢）加批《閱微草堂筆記》評語，周積明，南京大學出版社，1997，頁 168。狄氏所批有正書局於 1922 出版，筆者惜未見。

⁶ 如《如是我聞》卷四藉鬼狐之口，對宋儒「門戶交爭，遂釀為朋黨，而國隨以亡」，而「東林諸儒，不鑒覆轍，又驚虛名而受實禍」又重蹈宋儒近名好勝之弊，只能憑弔遺蹤相對嘆息，痛心疾首之情溢於言表：裘文達公嘗聞諸石東村曰：「有驍騎校，頗讀書，喜談文義。一夜，寓直宣武門城上乘涼，散步至麗樵之東，見二人倚堞相對語。心知為狐鬼，屏息伺之。其一舉手北指曰：『此故明首善書院，

門戶之分，多有持平之論⁷，可惜的是，竟不能引起眾人的注意，遂致使紀昀有「功魁罪首」般的評價。今就詩壇祖唐桃宋之爭論和漢學、宋學之相

今爲西洋天主堂矣。其推步星象，製作器物，實巧不可階；其教則變換佛經，而附會以儒理。吾曩往竊聽，每談至無歸宿處，輒以天主解結，故迄不能行，然觀其作事，心計亦殊黠。」其一曰：『君謂其黠，我則怪其太癡。彼奉其國王之命，航海而來，不過欲化中國爲彼教，揆度事勢，寧有是理？而自利瑪竇以後，源源續至，不償其所願，終不止。不亦偵歟？』其一又曰：『豈但此輩癡，即彼建首善書院者，亦復大癡。姦璫柄國，方陰伺君子之隙，肆其詆排，而群聚清談，反予以鈞黨之題目，一網打盡，亦復何尤。且三千弟子，惟孔子則可，孟子揣不及孔子，所與講肄者，公孫丑、萬章等數人而已。洛閩諸儒，無孔子之道德，而亦招聚生徒，盈千累萬，梟鸞並集，門戶交爭，遂釀爲朋黨，而國隨以亡。東林諸儒，不鑒覆轍，又驚虛名而受實禍。今憑弔遺蹤，能無責備於賢者哉！』方相對歎息，忽回顧見人，翳然而滅。」東村曰：「天下趨之如鶩，而世外之狐鬼，乃竊竊不滿也。人誤耶？狐鬼誤耶？」（前揭書，頁 229。）紀昀更將這種門戶之爭，以短短幾句話的故事，寫出門戶之爭，至死不休，甚至下徹黃泉：嘉祥曾英華言：一夕秋月澄明，與數友散步場圃外，忽旋風滾滾，自東南來，中有十餘鬼，互相牽曳，且毆且詈，尙能辨其一二語，似爭朱陸異同也。門戶之禍，乃下徹黃泉乎？（《槐西雜志》卷二，前揭書，頁 277）

⁷ 如前引〈周易義象合纂序〉所言，又如《灤陽消夏錄》卷一經香閣的故事中，紀昀曾就漢、宋二學關係作過辯論，表示了自己的持平看法：平心而論，《易》自王弼始變舊說，爲宋學之萌芽，宋儒不攻；《孝經》詞義明顯，宋儒所爭，只今文古字句，亦無關宏旨，均姑置勿議；至《尚書》、三禮、三傳、《毛詩》、《爾雅》諸注疏，皆根據古義，斷非宋儒所能；《論語》《孟子》，宋儒積一生精力，字斟句酌，亦斷非漢儒所及。蓋漢儒重師傳，淵源有自；宋儒尚心悟，研索易深。漢儒或執舊文，過於信傳；宋儒或憑臆斷，勇於改經。計其得失，亦復相當。（《灤陽消夏錄》卷一，前揭書，頁 10）相同的意見又見於〈黎君易注序〉：漢《易》言象數，不能離存亡進退，非理而何；宋《易》言理，不能離乘承比應，非象數而何。而顧曰：言理則棄象數，言象數即棄理，豈通論哉！余校定秘書二十餘年，所見經解，惟《易》最多，亦惟《易》最濫，大抵漢《易》一派，其善者必由象數以求理；或捨理者，必流爲雜學。宋《易》一派，其善者必由理以知象數，或捨象數者，必流爲異學。其弊一由爭門戶，一由驚新奇，一由一知半解，沾沾自喜，而不知《易》道之廣大，紛紜轆轤，遂曼衍而日增，殊不知《易》之作也，本推天道以明人事，故六十四卦之大象，皆有君子以字，而三百八十四爻，亦皆吉凶悔吝爲言，是爲百姓日用作，非爲一二上智密傳微妙也；是爲明是非決疑惑作，非爲讖緯祿祥預使前知也。故其書至繁至賾，至精至深，而一一皆切於事。既切於事，即一一皆可推以理。理之自然者明，則數之必然、象之當然，剖然解矣。又何必曰此彼法、此我法、此古義、此新義哉！（前揭書，頁 155）都可以看出紀昀致力於平息漢宋學門戶之爭，力求公允之論的用心。有關紀昀欲「屏除門戶，一洗糾紛」的討論，請參見拙作〈“屏除門戶，一洗糾紛”——論紀昀對漢宋之爭的持平之見〉一文，孔孟月刊 49 卷 1-2 期（577-578 期），2010 年 9-10 月。

爭，這兩方面對紀昀著述之影響，略述於後。

一、唐宋詩之爭

自北宋中期以後，蘇東坡、黃山谷詩的影響日益擴大，「宋調」有別於「唐音」而自成面目，唐宋詩之爭的問題遂逐漸產生，由明至清，歷數百年而不休。紀昀所處的時代也正是祖唐祧宋爭論非常激烈的時期，有沈德潛主張「格調說」，透過評選《唐詩別裁集》，反對清初的宋詩派，推崇唐詩；有袁枚主張「性靈說」，透過《隨園詩話》，反對沈德潛的觀點；有以姚鼐為代表的桐城派，透過評選《五七言今體詩抄》來宣揚唐宋詩並舉的主張。紀昀學詩並不偏頗祖唐或祧宋，他自稱：

余初學詩從《玉谿集》入，後頗涉獵于蘇、黃，於江西宗派亦略窺涯浚。嘗有場屋為余駁放看，謂余詆謫江西派，意在煽構，聞者或惑焉。及余所編《四庫書總目》出，始知所傳為蜚語，群疑乃釋。⁸

紀昀自己透過廣泛地學習，並且用了很多的精力，要去矯正祖唐祧宋兩派詩論的偏頗，希望能於兩派之中取其所長而棄其所短。我們看他評點整理過的書，便可以知道為何他喜歡對一些有爭議的詩集加以評點和圈閱。如方回的《瀛奎律髓》、李商隱的《玉谿生詩集》，馮舒、馮班批閱的《才調集》等，又有評點校正《玉臺新詠》，這些詩集，前人都有爭議和不同評價，於是他也通過評點來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中像《瀛奎律髓》一書的評點，就用了十年的功夫（38-48 歲），評閱至六、七次之多；《蘇文忠公詩集》也用了五年的功夫去點論（43-48 歲），評閱至五次之多，他自稱評點的情形，可以看見他用力之深。

余點評是集始於丙戌（1766）之五月，初以墨筆，再閱改用朱筆，三閱又改用紫筆，交互縱橫，遞相涂乙，殆模糊不可辨識，友朋傳錄，各以意去取之，續於門人葛編修正華處得初白先生（查慎行）批本，又補寫於罅隙之中，亦輻輳難別。今歲六月，自迪化歸，長晝多暇，因繕此淨本，以便省覽。⁹

他主要評點的著作有《瀛奎律髓刊誤》、《玉谿生詩說》、《刪正二馮先生評閱才調集》、《唐人試律說》、《紀曉嵐墨評唐詩鼓吹》等。此外，他對

⁸ 〈二樟詩鈔序〉，《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200 頁。

⁹ 紀評《蘇文忠公詩集序》。

杜甫、蘇軾、陳師道、黃庭堅等人的詩作也曾作過評點。《才調集》、《玉臺新詠》是主張西崑者最重視的兩部書，而李商隱正是西崑派的宗主。方回的《瀛奎律髓》主張「一祖三宗」，被認為典型的江西派的提倡者。陳師道即是「三宗」之一，除黃庭堅外江西派最重要的詩人。可見紀昀對這些書的評點，正是有意圍繞對此兩派的評價而開展的。這些大規模的評點，雖然在評點中沒有明確、集中地提出自己的論詩主張，但通過他對這幾種詩集評本的選擇和再評點，是可以看出他的論詩態度是：不要像方回那樣以江西詩派為尊，也不要像錢謙益、二馮那樣以晚唐詩歌為尊，而應該相容並蓄，博采各家之長，以發展當時的詩歌和詩歌批評。而紀昀以他淵博的學識、深厚的詩學根柢和相對公允、不帶偏見的詩歌觀點，通過自己一系列的評點，是對自清初以來至乾隆中期一百多年間主張祖唐祧宋論詩的爭議，進行了一次清算和糾偏。紀昀對西崑與江西都未嘗厚非，只是批評那種固執一端的見解，其《玉谿生詩說下·鈔詩或問》「問上黨馮氏評此詩如何」條中說：

二馮評才調集意在闢江西而崇崑體，於義山尤力為表揚。然所取多屑屑雕鏤之作而欲持之以攻江西，恐江西之生硬正亦如齊、楚之得失也。夫義山、魯直本源少陵，才分所至，面貌各別而俱足千古。學者不求其精神意旨所在而規規於字句之間，分門別戶，此詆粗莽，彼詆塗澤。不問曲直，哄然佐鬥，不知粗莽者江西之流派，江西本不以粗莽為長；塗澤者西崑之流派，西崑亦不以塗澤為長也。¹⁰

因此紀昀對兩派各持門戶之見、互相詆毀的言論都致不滿，才會用了這麼大的精力去矯正這兩派論詩的偏頗，主要還是要求於兩派之中取其所長而棄其所短。

所以在這樣唐宋詩之爭這樣的時代氛圍下，加上紀昀本身條件的配合¹¹，建立起帶著自己特色的詩論。他努力地在儒家學者的立場(理)和詩家文

¹⁰ 收入叢書集成續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1，頁28-29。

¹¹ 他本身內在的條件有：1.總纂《四庫》的際遇，讓他的眼界擴大、學問增長，所以他詩論有著能講明文學流變，帶著史的觀念的特色。2.理性思考的態度，讓他的詩論能破除門戶之見，力求公允。3.身兼文人、學者兩種身分（紀昀在姑妄聽之序中一段話可以看出來：余性耽孤寂，而不能自閑。卷軸筆硯，自束髮至今，無數十日相離也。三十以前，講考證之學，所坐之處，典籍環繞如癩祭。三十以後，以文章與天下相馳驟，抽黃對白，恒徹夜構思。五十以後，領修秘籍，復折

人的慧心(情)中取得平衡，因此紀昀的詩論帶著濃厚調和折衷的色彩，既調和各家優劣長短，又折衷抒情說理的偏頗。簡言之，在唐宋詩之爭的時代氛圍下，紀昀詩論因而有以下幾項特點：1.強調調和折衷、2. 態度公正，批評能除門戶之見、3. 批評能講明文學流變，帶著史的觀念：(1) 指出文學變的特性 (2) 重視個別的特色。¹²

二、漢宋學之爭

清乾隆、嘉慶年間，是漢學極盛，宋學起而抗之的時期。紀昀雖身處於「漢學家的大本營」¹³的四庫館中，從往交遊也多是漢學家朋友王鳴盛、錢大昕、朱筠、盧文弨、王昶、戴震之輩¹⁴。他本身的治學也傾向「崇漢抑宋」¹⁵，但他並不願偏廢一方，對待漢學和宋學，他持著一種理性的態度¹⁶，和一般人認為紀昀是漢學家的觀念有些出入。被魯迅稱為「前清的世故老人」紀昀，對他所贊同或反對的意見，往往很「世故」地「托狐鬼以抒己見」(魯迅語)，紀昀常藉著鬼狐或是他人之口或抨擊或諷刺或讚揚眾儒者，透過這些故事的描繪，可以去探索紀昀內心一些未曾言明的想

而講考證。《紀曉嵐文集》第二冊，375 頁)。

¹² 詳參〈紀昀詩論的時代背景與特色〉一文，黃瓊誼、王鵬凱，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70 期 (2007.7)。

¹³ 《清代學術概論》，梁啟超，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

¹⁴ 紀昀居於北京虎坊橋給孤寺旁，與王鳴盛寓齋僅隔一垣，兩人往還甚歡，以詩相酬，傳看紀昀所編的《張爲主客圖》(王鳴盛有〈虎坊新居與紀吉士昀隔一垣旁有給孤寺〉一詩)；又結識戴震成爲莫逆之交。戴震凡赴京師，總要居於紀昀家與他切磋商討學問，互訴別情(〈與余存吾太史書〉)。

¹⁵ 姚鼐曾任四庫館纂修官，至今仍可見所寫的提要 86 篇，收在《惜抱軒書錄》，道光十二年他的弟子毛岳生爲是書作序，描述了姚鼐在四庫館的處境：乾隆間考證之學尤盛，凡自天文、輿地、書數、訓詁之學皆備。先生邃識綜貫，諸儒多服，而終不與附和駁難，惟從容以道自守而已。時紀文達爲四庫全書館總纂官，先生與分纂。文達天資高，記誦博，尤不喜宋儒。始，大興朱學士筠以翰林院貯有《永樂大典》，內多古書，皆世闕佚，表請官校理，且言所以搜輯者。及是遺書畢出，纂修者益事繁雜，詆訕宋元來諸儒講述極庫隘謬戾，可盡廢。先生頗與辯白，世雖異同，亦終無以屈先生。文達特時損益其所上序論，令與他篇體例類焉。顯然姚鼐的意見，被紀昀更改，很難貫徹到提要中去，而且和其他館臣發生了爭辯，所以乾隆 38 年四庫開館，隔年姚鼐就乞養南歸。從本質上來看則是「惜抱(姚鼐)學術與文達(紀昀)不同，宜其柄鑿也。」(清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¹⁶ 閱微草堂筆記的理性主義，侯健，中外文學，8：1，頁 30-48。

法，去瞭解他治學的趨向究竟為何。因此從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中所刻劃的儒者形象，可以看出紀昀對當時儒者讚許與厭惡為何。從愛憎之中，可以得知紀昀對漢宋學的態度為何，同時也體現了他心中的治學標準為何。經過探析之後，可以看出，就通經的方法而言，紀昀崇漢學考據方法的實；而黜宋學空談先天、心性之虛，這是紀昀在治學方法上和程朱理學的立異處。他欣賞的是漢學重考據徵實的治學方法，但是透過考據的方法來明瞭經典的真意（通經），最終的目的還是在於落實到經國濟世的「致用」上，如果只是沉湎於復古，導致泥古而食古不化，成為迂腐的學究，甚至陷入繁瑣的考證弊病當中，紀昀也會毫不客氣地給予辛辣的諷刺¹⁷。正因為如此，紀昀重視通經致用的治學態度並不同於當時偏重於考據方法的漢學，只能說他是趨向漢學的治學態度，但不以漢學為藩籬。¹⁸

至於他對理學的態度，簡言之是：攻訐程朱理學末流之弊，是對程朱理學的修正，而非反對程朱理學。與程朱理學是治學方法上的差異，但在維護社會、安定人心的倫常教化上，並非是反對程朱理學的。紀昀雖然對

¹⁷ 如在《灤陽消夏錄》卷五中，紀昀對漢學流於繁瑣考據的弊端也有所不滿，對漢學之弊，一如對宋學之弊，同樣都給予辛辣的譏諷：朱青雲言，嘗與高西園散步水次。時春冰初泮，淨綠瀛溶。高曰：「憶晚唐有『魚鱗可憐紫，鴨毛自然碧』句，無一字言春水而晴波滑笏之狀，如在目前。惜不記其姓名矣。」朱沉思未對，聞老柳後有人語曰：「此初唐劉希夷詩，非晚唐也。」趨視無一人，朱悚然曰：「白日見鬼矣！」高微笑曰：「如此鬼，見亦大佳，但恐不肯相見耳。」對樹三揖而行。歸檢劉詩，果有此二語。余偶以告戴東原，東原因言有兩生燭下對談，爭春秋周正夏正，往復甚苦，窗外忽太息言曰：「左氏周人，不容不知周正朔，二先生何必費詞也？」出視窗外，惟一小僮方酣睡。觀此二事，儒者日談考證，講曰若稽古，動至十四萬言，安知冥冥之中，無在旁揶揄者乎？此外在《如是我聞》卷四中，藉著乾隆己卯、庚辰年間，獻縣掘得唐代大中七年明經劉伸所撰張君平墓誌一事，很難得地不借鬼狐之口，直抒對世人泥古謬見的批判：字畫尚可觀，文殊鄙俚。余拓示李廉衣前輩曰：「公謂古人事勝今人，此非唐文耶？天下率以名相耀耳。如核其實，善筆札者必稱晉，其時亦必有極拙之字，善吟詠者必稱唐，其時亦必有極惡之詩，非晉之廝役皆羲、獻，唐之屠沽皆李、杜也。西子、東家，實為一姓；盜跖、柳下，乃是同胞，豈能美則俱美，賢則俱賢耶？賞鑒家得一宋硯，雖滑不受墨，亦寶若球圖；得一漢印，雖謬不成文，亦珍逾珠璧，問何所取？曰：『取其古耳。』東坡詩曰：『嗜好與俗殊酸鹹』斯之謂歟！」

¹⁸ 詳參拙作〈從《閱微草堂筆記》中之儒者形象看紀昀的治學趨向〉，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20期，頁73-115。

理學末流之弊深惡痛絕，對揭露理學末流之弊的醜態不遺餘力，但是細究之，紀昀卻不是全然地反對理學。紀昀和理學的扞格不入是治學方法上的差異，但在維護社會、安定人心的倫常教化上，和程朱學說所提倡的並無二致，可謂殊途而同歸。在《閱微草堂筆記》中記載的真君子多是理學家，紀昀對真君子劉君琢¹⁹、周姓老儒²⁰、魏環極²¹等人形象的描繪，並不會因他們講理學就醜詆他們，也是寫出鬼狐對他們的欽敬，所以紀昀對理學主敬立誠、躬行自修的功夫還是相當地敬佩，因此才有這樣對講學家正面形象的描寫，而紀昀在治學和立身處世的態度，倒頗有「治經宗漢儒，立身宗

¹⁹《槐西雜志》卷三，前揭書，頁 315-316。交河老儒劉君琢，居於閭家廟，而設帳於崔莊。一日，夜深飲醉，忽自歸家，時積雨之後，道途間兩河皆暴漲，亦竟忘之，行至河干，忽又欲浴，而稍憚波浪之深。忽旁有一人曰：「此間原有可浴處，請導君往。」至則有盤石如漁磯，因共洗濯。君琢酒稍解，忽嘆曰：「此去家不十餘里，水阻迂折，當多行四五里。」某人曰：「此間亦有可涉處，再請導君。」復攝衣徑度，將至家，其人匆匆作別去。叩門入室，家人駭路阻何以歸，君琢自憶，亦不知所以也。揣摩其人，似高川賀某，其或留不住(村名，其取義則未詳)趙某。後遣子往謝，兩家皆言無此事，尋河中盤石，亦無蹤跡，始知遇鬼。鬼多鬚醉人，此鬼獨扶導醉人，或君琢一生循謹，有古君子風，醉涉層波，勢必危，殆神陰相而遣之歟！

²⁰《槐西雜志》卷四，前揭書，頁 366。先師陳白崖先生言業師某先生，(忘其姓字，似是姓周)篤信洛閩，而不驚講學名，故窮老以終，聲華闐寂，然內行醇至，粹然古君子也。嘗稅居空屋數楹，一夜，聞窗外語曰：「有事奉白，慮君恐怖奈何！」先生曰：「第入無礙。」入則一人戴首於項，兩手扶之，首無巾而身爛衫，血漬其半。先生拱之坐，亦謙遜如禮。先生問何語？曰：「僕不幸明末戕於盜，魂滯此屋內。向有居者，雖不欲為崇，然陰氣陽光互相激搏，人多驚悸，僕亦不安。今有一策，鄰家一宅，可容君眷屬，僕至彼多作變怪，彼必避去，有來居者，擾之如前，必棄為廢宅，君以賤價購之，遷居於彼，僕仍安居於此，不兩得乎？」先生曰：「吾平生不作機械事，況役鬼以病人乎？義不忍為，吾讀書此室，圖少靜耳，君既在此，即改以貯雜物，日扃鎖之可乎？」鬼愧謝曰：「徒見君案上有性理，故敢以此策進，不知君竟真道學，僕失言矣！既荷見容，即託字下可也。」後居之四年，寂無他異，蓋正氣足以懾之矣。

²¹《姑妄聽之》卷二，前揭書，頁 410。相傳魏環極先生，嘗讀書山寺，凡筆墨幾榻之類，不待拂拭，自然無塵，初不為意，後稍稍怪之。一日晚歸，門尚未啓，聞室中窸窣有聲，從隙竊覘，見一人方整飭書案，驟入掩之，其人瞥穿後窗去，急呼令近，其人遂拱立窗外，意甚恭謹，問：「汝何怪？」罄折對曰：「某狐之習儒者也，以公正人不敢近。然私敬公，故日日竊執僕隸役，幸公勿訝……公剛大之氣、正直之情，實可質鬼神而不愧，所以敬公者在此」

宋儒」、「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²²的意味。再看紀昀所譏諷的講學家，有的是苛刻不近人情、動輒以禮苛責；有的是矯作虛偽、言行不一、口是心非、貪財害人的假道學，這些末流之弊，難道就因為講理學就不能被批評嗎？所以邱煒菱（菽園）才說「《齊諧》攻宋儒，每每肆意作謔，殊不足服理學家之心。《五種》攻宋儒，架空設難，實足以平道學家之氣」²³，指的就是紀昀所針砭的的確是理學的末流之弊，講學家豈能以汗巖視之。因此從他對講學家正反兩面的形象描寫看來，紀昀反對的是理學的末流弊端，痛恨的是虛偽的假道學罷了，對德行醇然、躬行自修的理學家，仍然是心折的。但或許是這世上小人多而君子少，造成寫假道學的篇章多，寫真君子的篇章少，於是讓人產生錯覺，以為紀昀是攻訐程朱理學的。而紀昀在針砭宋學末流之弊時，無疑地也是在對程朱理學的修正，例如在對假道學形象的刻畫時，就寫出真君子的形象以作為典範；在對講學家苛刻不近人情形象的刻畫時，就提出較寬容的意見「飲食男女，人生之欲存焉。干名義、瀆倫常、敗風俗，皆王法之所必禁也，若癡兒騃女，情有所鍾，實非大悖於禮，似不必苛以深文」²⁴、「程子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是誠千古之正理，然為一身言之耳，此婦甘辱一身以延宗祠，所全者大，似又當別論矣」²⁵等意見，以修正逐漸僵化而不近人情的禮教。以守節為例，紀昀一方面對貞節烈婦倍加推崇²⁶，但又因他深知守節的不易與艱辛，

²² 江藩：《經解入門》卷三〈漢宋門戶異同〉節（天津市古籍書店，1990年），頁74。江藩治學雖宗漢學，但對宋儒修身的功夫卻頗推服「學者治經宗漢儒，立身宗宋儒，則兩得矣」、「本朝為漢學者，始於元和惠氏，紅豆山房半農人手書楹帖云：『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不以為非，且以為法，為漢學者背其師承何哉！藩為是記，實本師說。」

²³ 邱煒菱：《客雲廬小說話》卷一〈菽園贅談〉，光緒二十三年刊本。

²⁴ 《灤陽續錄》卷五，前揭書，頁555。

²⁵ 《灤陽續錄》卷一，前揭書，頁505。

²⁶ 紀昀在逝世前兩年的禮部尚書任內（1803），上一道摺子〈請敕下大學士九卿科道詳議旌表例案摺子〉，為烈婦「猝遭強暴，力不能支，捆縛捺抑，竟被姦汙者」「例不旌表」不近人情的規定翻案，又如《槐西雜志》卷四「倪媼，武清人，年未三十而寡。舅姑欲嫁之，以死自誓。舅姑怒，逐諸門外，使自謀生。流離艱苦，撫二子一女，皆婚嫁，而皆不才。煢煢無倚，惟一女孫度為尼，乃寄食佛寺，僅以自存，今七十八歲矣。所謂青年矢志白首完貞者歟！余憫其節，時亦周之。馬夫人嘗從容謂曰：『君為宗伯，主天下節烈之旌典，而此媼失諸目睫前，其故何

所以能較寬容地看待改嫁之事，而能依據實際狀況，不堅持如程頤所說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紀昀不是反對禮法，他攻擊的是不通的禮法、荒謬的習俗，希望在遵循禮法時，又能兼顧人情，否則「必激而蕩於禮法外矣」，紀昀不像戴震激動地直接控訴以理殺人，不像吳虞聲嘶力竭地喊出吃人的禮教²⁷，他是曲折地透過《閱微草堂筆記》中一則則的故事，來喚醒日趨苛刻禮法中的人情。從《閱微草堂筆記》中紀昀對三綱五常、忠孝節義等倫理道德，仍是不餘遺力地提倡與遵守，全書中忠臣、孝子、節婦獲得鬼神欽敬、呵護的例子比比皆是²⁸，在維護社會秩序與行為規範的

歟？」余曰：「國家典制，具有條格。節婦烈女，學校同舉於州郡，州郡條上於臺司，乃具奏請旨，下禮曹議，從公論也。禮曹得察核之、進退之，而不得自搜羅之，防私防濫也。譬司文柄者，棘闈墨牘，得握權衡，而不能取未試遺材，登諸榜上。此媼久去其鄉，既無舉者；京師人海，又誰知流寓之內，有此孤嫠？滄海遺珠，蓋由於此。豈余能為而不為歟？念古來潛德，往往借稗官小說，以發幽光。因撮厥大凡，附諸瑣錄。雖書原志怪，未免為例不純；於表章風教之旨，則未始不一耳。」（前揭書，頁 373-374），則是不忘為於律無法褒揚的節婦傳名。

²⁷ 吳虞：〈吃人與禮教〉，「孔二先生的禮教講到極點，就非殺人吃人不成功，這真是殘酷極了！一部歷史裏面，講道德、說仁義的人，時機一到，他就直接間接地都會吃起人肉來。就是現在的人，或者也有沒做過吃人的事，但他們想吃人，想咬你幾口出氣的心，總未必打掃得乾乾淨淨。……我們應該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講禮教的，講禮教的就是吃人的呀！」（《新青年》6：6（1919））。

²⁸ **忠臣之例**如〈灤陽消夏錄〉卷三「有廝養曰巴拉，從征時遇賊，每力戰，後流矢貫左頰，鏃出於右耳之後，猶奮刀砍一賊，與之俱僕。後因事至孤穆第（在烏魯木齊、特納格爾之間），夢巴拉拜謁，衣冠修整，頗不類賤役。夢中忘其已死，問向在何處？今將何往？對曰：「因差遣過此，偶遇主人，一展積戀耳。」問何以得官？曰：「忠孝節義，上帝所重，凡為國捐生者，雖下至僕隸，生前苟無過惡，幽冥必與一職事；原有過惡者，亦消除前罪，向人道轉生。奴今為博克達山神部將，秩如驍騎校也」（前揭書，頁 47），**孝子之例**如〈灤陽消夏錄〉卷三「去余家十餘里，有瞽者姓衛，戊午除夕，偏詣常呼彈唱家辭歲，各與以食物，自負以歸。半途失足，墮枯井中。既在曠野僻徑，又家家守歲，路無行人，呼號嗟乾，無應者。幸井底氣溫，又有餅餌可食，渴甚則咀水果，竟數日不死。會屠者王以勝驅豕歸，距井有半里許，忽繩斷，豕逸狂奔野田中，亦失足墮井，持鉤出豕，乃見瞽者，已氣息僅屬矣。井不當屠者所行路，殆若或使之也。先兄晴湖問以井中情狀，瞽者曰：「是時萬念皆空，心已如死。惟念老母臥病，待瞽子以養。今並瞽子亦不得，計此時恐已餓殍，覺酸徹肝脾，不可忍耳。」先兄曰：非此一念，王以勝所驅豕必不斷繩」（前揭書，頁 55），**節婦之例**如〈灤陽消夏錄〉卷二記「一日，喧傳節婦至，冥王改容，皆振衣佇迓。見一老婦纍然來，其行步步漸高，如躡階級，比到，竟從殿脊上過，莫知所適。冥王憮然曰：『此已升天，不在吾鬼錄中矣。』」（前揭書，頁 35）。

目標上，和程朱學說所提倡的並無二致，可謂殊途而同歸，他只是遵循著儒家的中庸之道，去修正理學極端化的弊病，以「深具彈性的理」²⁹，更貼近人情常理，以避免流於苛刻不近人情的弊病。所以如同紀昀八十大壽時，他的門生汪德鉞所說的「意旨不若合符節歟」：

（紀昀）平生講學，不空持心性之談，人以為異於宋儒，不知其牖民於善，防民於淫，拳拳救世之心，實導源洙泗。即偶為筆記也，以為中人以下，不可與莊語，於是以厄言之出，代木鐸之聲。乍視之，若言奇言怪；細核之，無非富懲勸以發人深省者。柳子厚云：「即末以操其本，可十七八」，此與濂洛關閩拯人心沉溺者，意旨不若合符節歟？³⁰

也難怪章太炎《釋戴》篇會記載著，當紀昀看到一向與之交好的戴震所著的《孟子字義疏證》後，竟「攘臂而扔之」，可見他憤怒的程度，認為該書「以誹清淨潔身之士，而長流汙之行」³¹，原因或許就在紀昀並不是反對程朱理學的³²，而是藉著批判、譏諷末流之弊來修正程朱理學，以達到他心中理想的境地。所以我們可以知道紀昀攻訐程朱理學末流之弊，是對程朱理學的修正，在維護社會、安定人心的倫常教化上，並非是反對程朱理學的。故而徐世昌在《清儒學案》中評論紀昀，除了點出了《四庫全書總目》「創自古簿錄家所未有」在學術上的成就，也說出紀昀「持論屏除門戶，一洗糾紛」要一洗漢宋學的糾紛，和矯正程朱理學末流之弊「欲矯

²⁹ 侯健：〈閱微草堂筆記的理性主義〉，中外文學，8：1，頁30-48。

³⁰ 汪德鉞：，《四一居士文抄》卷四〈紀曉嵐師八十序〉（《稀見清人別集叢刊》第12冊，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332-333。

³¹ 「夫言欲不可絕，欲當即為理者，斯固蒞政之言，非飭身之典矣。辭有枝葉，乃往往軼出闕外，以詆洛、閩。紀昀攘臂扔之，以非清淨潔身之士，而長流汙之行，雖焦循亦時惑。」《章太炎全集》第四冊〈釋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123。

³² 劉聲木（1878-1959）認為紀昀批判陸王之說更是不遺餘力「程朱與陸王二派，若水火之不相容，習程朱者無不攻陸王，習陸王者亦然。紀文達公昀為昭代大儒，學問淵雅，志識高卓，未聞以程朱、陸王之學自囿也。其撰《四庫提要》，於程朱之學，雖有微詞，不過不服膺而已，未至於如陸王之學，則攻擊不遺餘力，雖未明言禁人學習，極言其流弊所至，不知底止。可見公道自在人心，非區區口舌所能強爭也」，〈四庫提要推重程朱〉，《菴楚齋續筆》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232。

宋明末流之弊」的用心，可謂是深知紀昀學術成就與思想內涵的評語：

獻縣（紀昀）以通儒遭際明盛，綜覽四部，考證詳明，創自古簿錄家所未有。其持論屏除門戶，一洗糾紛，而欲矯宋明末流之弊，頗有所抑揚。³³

而紀昀能有這樣的成就，一來是本身的條件「通儒」（內因），二來是大時代的氛圍「遭際明盛」（外緣），兩者搭配所造成的，這正說明了時代環境對紀昀著述的影響。

結語

由於大時代環境的因素，讓紀昀無可避免地必須對學漢宋學、唐宋詩之爭表達出自己的看法，進而影響到紀昀治學的特色。面對著唐宋詩之爭，紀昀自己透過廣泛地學習，並且用了很多的精力，去對一些有爭議的詩集加以評點和圈閱，要去矯正祖唐桃宋兩派詩論的偏頗，希望能於兩派之中取其所長而棄其所短。他努力地在儒家學者的立場(理)和詩家文人的慧心(情)中取得平衡，因此紀昀的詩論帶著濃厚調和折衷的色彩，既調和各家優劣長短，又折衷抒情說理的偏頗。

面對著漢宋學之爭，透過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中對儒者形象的刻畫，可以看出紀昀對當時儒者讚許與厭惡為何。從愛憎之中，可以得知紀昀對漢宋學的態度為何，同時也體現了他心中的治學標準為何。經分析之後，紀昀對漢宋學的態度是紀昀重視通經致用的治學態度並不同於當時偏重於考據方法的漢學，只能說他是趨向漢學的治學態度，但不以漢學為藩籬。而攻訐程朱理學末流之弊，是對程朱理學的修正，而非反對程朱理學。與程朱理學是治學方法上的差異，但在維護社會、安定人心的倫常教化上，並非是反對程朱理學的，這有別於紀昀為學揚漢抑宋的印象。

可惜的是紀昀欲藉著辨漢宋儒術之「是非」和析詩文流派之「正偽」之後，能「屏除門戶，一洗糾紛」的理想，還是無法達成。畢竟他對這兩者之爭的許多持平言論，竟不能引起眾人的注意，終究為眾人所忽視。

³³ 〈獻縣學案〉，《清儒學案》第4冊卷80，徐世昌，世界書局，1962，頁1。